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盛世危言

郑观应 著
陈志良 选注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尊隐 大同书

默觚 仁学

采西学议 建国方略

使西纪程 砭旧危言

弢园文录外编

筹洋刍议 馘书

盛世危言 新民说

论世变之亟 猛回头

新政真诠 睡的人醒了

强学一戊戌时论选

民声一辛亥时论选

新潮一民初时论选

(辽)新登字1号

陈世危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陈志良选注.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61-2

- I. 盛…
II. ①郑…②陈…
III.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②政治-中国-近代-选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8,000 印张:9 $\frac{1}{4}$ 插页:5

印数:1—1,596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朱枫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刘亚杰
版式设计:赵耀今

定价:9.7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血与火打开了中华天朝帝国的大门。沉沉昏睡的中国人看到了一幅自身难以理解的画面，历来以世界中心之国自居的中国，居然大大落后于西方和世界。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人关切和奋起的主旋律。启蒙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涵。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力图摆脱愚昧、落后和贫困，求富强、求奋起、求发展的启蒙史。

中国近代启蒙的历史舞台，迅速演出一幅幅壮丽的活剧，它至今催人深思，动人心弦。先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冯桂芬为代表的早期爱国主义思潮登台呐喊，催国人从沉睡中惊起。而后，形成了两股新的思潮，一股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丁日昌、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思潮，另一股则是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郭嵩涛、容闳、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思潮，而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正是中国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它们在中国的启蒙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起到使国人由改良进到维新再到变革的中介作用，至今仍映现着它的现实意义。

郑观应（18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僊鹤山人，罗浮僊鹤山人、慕雍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雍陌乡人。郑观应既是中国近代最早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思想家，又是一位由买办转化过来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民族资本家。他一生中有近六十五年时间忙于各种工商业的实践活动，曾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郑观应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与洋务派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过从甚密，但也明显地暴露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郑观应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曾向李鸿章提出十六条建议，认为招商局应办成仿照西方国家的公司，由股东公举董事、总协理，力图克服“官派陋习”，但李鸿章并没有接受郑观应的倡议。又如，由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因是官办的，企业亏损难以维持。盛宣怀推荐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在铁厂按西方经营原则整顿企业，将官办章程改为公司，仿西人商律办法，这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同样也没有被盛宣怀所接纳。正是与洋务派的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使郑观应的启蒙思想迅速地发育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富强救国”改良主义思想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由于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盛世危言》曾有二十多种版本，成为我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

多的一本书，但其中大多数版本是出版者自行出版，未经郑观应册定。经郑观应本人审定并加序的是三种版本：一是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五卷本；二是1895年增订新编的《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三是1900年增订新编的《盛世危言》八卷本。五卷本有文五十七篇，加附言、附录三十篇，共八十七篇；十四卷本在五卷本的基础增加了一百十三篇，成二百篇，文字达五十五万；八卷本与十四卷本有增有减，基本相仿。这次出版，从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中精选六十四篇，以飨读者。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宣传的改良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郑观应出身于一个与买办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受封建庭训，17岁考秀才未中，于是离开家乡去上海投奔在新德洋行当买办的叔叔郑秀山，并开始学习英语，在办实业的生涯中逐渐形成改良主义思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反映出他的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梯。1873年3月，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刊行，思想尚停留于因果报应与触景伤时略陈利弊两个方面，封建思想与改良思想萌芽同时并存。1880年冬，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由中华印务总局刊行，《易言》舍弃了《救时揭要》中封建迷信的弱点，发挥了《救时揭要》的积极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律法、税务等各个方面，集中宣传了中国要富强必须改革，走效法西方国家的路。《易言》成为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为《盛世危言》构思创造了

条件。

《盛世危言》作为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的成熟著作，书中所宣传的下列思想是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一是“富强救国论”。

“富强救国”是郑观应的救国方略，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富强救国”本质上是实业救国，郑观应不同于洋务派的根本之点在于，他认为要富国先要富民，富民才是富强之本，是世界各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共同点。郑观应指出：“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①因而，郑观应的改良思想是从“实业为本”与“民为本”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的。郑观应曾以煤矿为例，力述其富强之道。他认为，中国有煤矿可开采量一千万亿吨，足够一千年之开采，但现在须大量进口煤，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大量引入外资，创造外资适宜生存的“良好之矿法”，二是彻底改变官署发号施令的“官办”之风。只要按此良策运转，“以中国矿产之富，矿苗之旺，人工之廉，诚定有良好矿法，吸入外资办理，又得公正廉洁才干明敏之员，将不十年必变为煤铁输出国矣，又何至仰赖外人接济也哉。”^②但郑观应的富强方案，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理想，是一个早熟的夭折儿。郑观应一生奔波于

① 《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页。

② 《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2页。

实业，但各种事业“十举九败”，处处碰壁，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生存和思想状态，使郑观应触及到一些极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人们和后来者带来更大的历史深思。

二是“重商论”和“商战重于兵战论”。

在如何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这一根本问题，洋务派与改良派发生了根本分歧。洋务派把“师夷长技”看作是富强之本，主张练兵、制舰、造枪炮、习外语等，实际上只是增强清朝帝国的专制统治力量而已。改良派则走着另一条道路，他们把发展经济看作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出路。重商、重实业、重经济，是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论”，薛福成呼喊“商握四民之纲说”，马建忠力陈“富民说”，陈炽强调“富国策”，目的都是强调经济在富国中的重要地位。郑观应则进一步提出商为国之本的“重商论”。郑观应认为以农为本这是古代社会的特点，而现代社会则以商为本、以商富国，“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商务一》）中国之所以在今日弱于外洋，其原因盖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商务三》）因此，商对于当今中国具有根本意义，“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务二》）

“商战论”或“商战重于兵战论”，是郑观应“重商论”中的重要思想。郑观应认为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是同时并用的两手，即“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商务三》）而且“兵战”与“商战”之两手，往往

以“商战”为先、为目的，因此“商战重于兵战”。郑观应提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为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上》）

从商战重于兵战这一立场出发，郑观应批判了洋务派只知“兵战”而不知“商战”的做法，认为他们是“舍本图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郑观应提出，要强国不仅要“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更重要的是要“讲求泰西土、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商战下》）应该指出，郑观应的“商战论”中的商战，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多内容的综合范畴。围绕“商战”，郑观应提出收归海关、保护关税等主张，要求清政府实行护商而不病商的国策，但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郑观应的商战重于兵战，护商而不病商的思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三是设议院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杰出地体现在设议院的种种意见上。早在1884年，郑观应便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被清政府斥为“狂妄之言”。^①应该说，郑观应在甲午海战前便激烈地倡导设议院，是极有胆识的。郑观应认为设议院是

^① 《郑观应集》下，第303页。

“富强之本”，西方行议院制而国富强，东方的日本亦因维新立议院而勃然兴起，中国要富强也应走设议院制的道路。此外，他还认真研究了各国的议会制，认为有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他力主中国实现君民共主制。郑观应指出：“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议院下》）他致力于君主立宪，称“方今二十世纪立宪时代”，^②“非立宪国几不能立于世界，”^③但郑观应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也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

在“体”“用”问题上，郑观应大大超越了当时的洋务派。洋务派们认为，中国落后于世界，其原因在于“用”不如西方，而“纪纲法度，人心风俗”的伦理政治体制即“体”则优越于西方，因而只须“中体西用”便可富强于世界。郑观应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仅在于“用”，而且“体”也必须予以改革。他批评洋务派：“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盛世危言》自序）因此，中国欲自强非变法、变体不可，除了设议院，开国会，

① 《郑观应集》下，第310页。

② 《郑观应集》下，第322页。

郑观应还认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主张对政治进行全面改革；他的“公举”、“日报”、“吏治”、“限仕”、“汰冗”、“革弊”、“建都”等文章，提出许多好的政治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在现在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当今改革时代的思考能提供一个参照系。

四是提倡习西学仿效西人之法。

郑观应在“中学”与“西学”问题，认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西学》）尽管他认为“西学”的本是中国过去的，其实质是“中学”，但仍然大力提倡学习“西学”，并主张把“西学”引入选拔人才的考试的内容。

郑观应对于“西学”的内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西学”分类为天学、地学、人学三大类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西学》）“西学”中包含着工艺学和社会科学。他主张“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学校》）对于“西学”与“中学”的矛盾，郑观应不像后来者那样尖锐对立，而主张中西并用，实事求是。

郑观应在办实业的实践活动中，力主仿效西人之法办

企业，走公司、股份制、有限公司的道路。郑观应把“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作了比较，他认为“历观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闻近年中国商情，惟棉纱匹头大占利益，上海纺纱局获利甚厚，而湖北织布局（官办的）仍虞折阅。其故何哉？窃恐各委员不免仍拘官场积习，非但不知商务利弊，不通权变而已也。”（《商务二》）郑观应在当时条件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商务二》）但郑观应的思想是早熟的，在当时中国很难奏效。在郑观应那个时代，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是中国三大公司，也无法与西方公司并驾齐驱。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郑观应感叹地说：“呜呼！以办旨成效之三大公司，犹以官督商办之故不能与泰西各公司竞争于世界之舞台，此中国商业之所以日居退败也。”^①为改变这一状况，郑观应上书清政府，要求“朝廷设立商部，尤须顾名思义为民谋利益，不可与民争利权。”^②历史是一面镜子。郑观应关于“官办”与“民办”，以及政府为民谋利益不可与民争利权的思想，对于当今中国如何进一步改革，如何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何竞争于世界舞台，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意

① 《郑观应集》下，第622页。

② 《郑观应集》下，第622页。

义。

五是改革学校科举制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强调指出，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是富强之根源。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极其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认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学校上》）为此，郑观应研究了德、英、法、美、日的学校规制，特别推崇日本的教育兴国的大略，指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养之善，培育人才，居然国势振兴，我国胡可不亟力行之？一语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①对于学校的体制，郑观应主张设小学、中学、大学，宜“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为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省会、京师者为大学。”（《考试下》）考试内容也要进行改革。郑观应认为旧科举制理论脱离实际，“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学校上》）为了学以致用，广开才路，郑观应主张在文、

^① 《郑观应集》上，第261页。

武正科外，另设艺科、专科，对“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学校上》）郑观应的这些想法，都是极有意义的。

为了使人尽其才，郑观应指责了中国封建礼教，认为“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女教》）他希望清政府能改变这一状况，“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女教》）郑观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主张大办工艺学校，认为“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学校上》）郑观应认为，只要关心教育，多种渠道培养选拔人才，中国富强可望，“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学校上》）

《盛世危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作了批示并印了二千部分发各省有司，而国内各书坊立即辗转翻刻，印至十多万部之多。当时国内科举，也往往用《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时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盛世危言》对尔后的维新派产生巨大影响，谭嗣同把“商战”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重大内容，孙中山也这样那样受到《盛世危言》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读了《盛世危言》，激起救国的强烈愿望，并由此离开湘潭而去长沙求学业。当著名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回忆起这一段历史，说“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

本书我非常喜欢。”^①可见，《盛世危言》一书的作用是进步的。

在《盛世危言》出版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这本名著，仍然获得不少教益和启迪。《盛世危言》为什么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究其原因，在于《盛世危言》所揭示的“富强救国”的具体内容，是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实践中天天遇到并要化大力气解决的。说到底，《盛世危言》的主题也就是现代化问题。西方各国在17世纪后率先迈入现代化的道路，尔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也步入了现代化之路。中国，这个曾在历史上有灿烂文明并对人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恰恰在西方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时刻落后于西方，成为当代的落伍者。中国怎么办？中国要不要走上现代化的富强之路？中国如何走上现代化的富强之路？这正是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盛世危言》当然会引起现代人的关注。

历史是奇特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本来应该较快地提出现代化问题，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现代化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消失了。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在这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之后，人们才痛定思痛，重新高举起现代化的旗帜。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7年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指出：“日本人从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